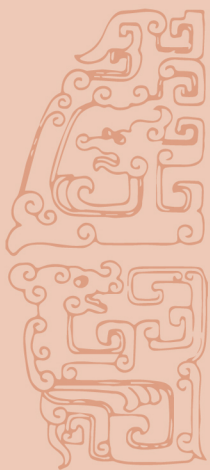


先秦

Xianqin
Wenxue Zhuaniti Yanjiu

夏德靠 著

文学专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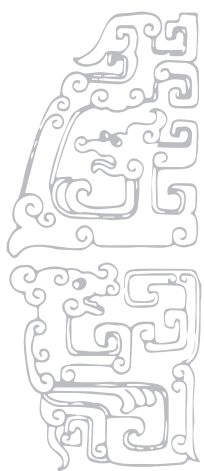


中国言实出版社

Xianqin
Wenxue Zhuaniti Yanjiu

夏德靠
著

文学专题研究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文学专题研究 / 夏德靠著. — 北京 : 中国言
实出版社, 2021.9

ISBN 978-7-5171-3839-6

I . ①先… II . ①夏… III .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先秦时代 IV . ①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169612 号

责任编辑 罗 慧
责任校对 崔文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6 号院 B 座 6 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版 次 2021 年 9 月第 1 版 202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6 印张

字 数 234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ISBN 978-7-5171-3839-6

前 言·····	1
第一章 孔子“删诗”与《诗经》文本的再经典化·····	5
一、孔子“删诗”说源流及相关争论·····	6
二、季札观乐与早期《诗》本的传布·····	11
三、孔子“正乐”与“删诗”·····	23
四、儒家《诗》文本生成及“经典化”·····	30
第二章 原史群体及传史方式·····	33
一、原史的职能·····	34
二、从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	39
三、记注与撰述·····	44
第三章 《尚书》文体类型及其生成·····	50
一、《尚书》文体类型的划分·····	50
二、“因事名篇”与《尚书》文体的生成·····	56
三、《尚书》“六体”的内涵及意义·····	61
第四章 《国语》的编撰与国别体的形成·····	81
一、国别体析论·····	81

二、左丘明与《国语》	89
三、“八语”的遴选与国别体的生成	96
第五章 孔子与《春秋》	106
一、“春秋”的含义及“春秋”类文献	106
二、“诗亡而《春秋》作”	112
三、孔子作《春秋》	118
四、《春秋》的叙事特征	126
第六章 《左传》与事语体的演进	135
一、《左传》的编撰	135
二、“语”与“春秋”	139
三、“事语”与编年	142
第七章 《战国策》与事语体的成熟	146
一、事语体的类型	146
二、《战国策》的编撰及文体特征	153
第八章 《论语》与语录体的生成	159
一、从语录体的相关讨论说起	161
二、《论语》的编撰与语录体的创制	172
第九章 赠言传统与《老子》生成	186
一、祖轅与赠言传统	189
二、老子的身份与职业	200
三、《老子》的文本特征	209

第十章 《庄子》“卮言”的文体意蕴及其特征·····	212
一、从“合语”到“优语”·····	212
二、“优语”的重构与《庄子》“卮言”的生成·····	218
三、《庄子》“三言”及“卮言”的文体存在·····	226
参考文献·····	235

前 言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先秦文学是颇为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为这个时期的作品并非纯粹之文学，而同时伴随其他身份。也就是说，先秦文学作品在文学身份之外，它们或属于经，或属于史，或属于子，并且，后者在身份上更具原始性。我们现在视为文学的那些先秦时期的作品，它们原初身份可能是史，或者子，或者经，经、史、子才是它们的原初面貌。这是我们在讨论先秦文学时首先应该注意的。

但是，尽管先秦作品的原初身份可能是史，或者子，或者经，这些或经、或史、或子的作品毫无疑问又具有文学性。这就表明，经、史、子的身份并不必然排斥文学性，它们之间有相融的一面。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正是因为这种缘故，对于先秦时期的作品，人们可以从多重角度去审视，可以把它们视为经，或史，或子。当然，人们也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它们。并且，即使从文学的角度去考察它们，也不妨结合经、史、子的视角和方法。

在一定意义上，经、史、子或许还不是先秦文学作品的原初身份，我们其实首先应该将它们理解为某种文献，从文献的角度去揭橥先秦文学作品的特质。所谓“文献”，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①将“文献”分为“叙事”与“论事”，是很有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意思的解释。朱熹《集注》将“文献”分为“文”与“献”两个部分，“文”指典籍，“献”指贤人。^①这就意味着“文献”包括书面与口头两个层面。他们的解释对于领会先秦时期作品的特征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对于文献来说，它往往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具有实用的特性，换言之，文献有很强的实用功能。这样，从文献的角度去解读先秦文学作品，不仅有利于揭示它们的用途，而且有利于还原其生成语境。比如《国语》，它为何只遴选八国之“语”，这是因为“周德衰落，一蹶不振，人们就慨叹‘一姓不再兴’；宋襄公的图霸失败，再次强化了这样的意识，于是人们的目光便转移到了代兴的诸侯身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势力会代衰周而起呢？以‘明德’为目的的《国语》，除了收编当朝及与之关系特别密切的诸侯国（如鲁国）的‘语’以外，自然也更愿意从这些曾经称霸的诸侯（齐、晋、郑、楚、吴、越）身上总结经验教训，这就有了《国语》之八《语》”^②。据说墨子见过“百国春秋”，这意味着当时各诸侯国都有本国之“语”。左丘明借助自己瞽矇的有利身份，收集各国之“语”，并基于“明德”的目的，在周、鲁等八国的名目下，整合这些“语”而成《国语》。据此，就可以比较清晰地揭示《国语》的生成语境及其功能。

再进一步看《国语》的具体篇章，不难发现，很多篇章呈现“三段式”结构，具体表现为“缘起+谏辞文献+附加文本”，这是《国语》文本比较独特的话语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体”。这种文体以谏辞文献为核心文本，一般来说，“纳谏”的，只具备前两个部分；对于规谏而不接纳的，则具备三个部分，一定会在其文尾记载可能有的后果。《国语》中的谏辞在雍容平和中折射出规谏者渴求“违礼者”明德的愿望，但另一方面，编纂者在表达自己的意图时是很隐蔽的，他主要借助规谏结果的书写方式来达到这一目标。规谏结果往往是一些客观历史事件，这些冷冰冰的事实除了表达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外，其本身很难说蕴含多少感情。但是，当编纂者把这些事实置于特定的语境下，立即在平面的结构中体现出编纂者的某种意图。也就是说，《国语》采取

① 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72页。

② 俞志慧：《国语的文类及八语遴选的背景——从“语”的角度的研究》，《文史》，2006年第2辑。

这种文体，实际上表明了对“持礼”的赞同，对“违礼”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编纂者的书写方式就与《国语》这部文献的“明德”功能是一致的。由此可以看出，“文献”与“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

事实上，对于先秦文学及其作品而言，无论是分析其文本的思想内容，还是讨论其文学特色，“文献”与“文体”是两个有效的阐释视角。“文献”的视角通常注重文本的生成，而“文体”的视角则侧重于话语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往往呈现为文学特色；并且，无论是“文献”视角还是“文体”视角，均与文本的思想内容勾连在一起。当然，对于“文献”与“文体”而言，“文献”通常是个体性的，每一部文献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都具有其他文献所不可替代的功能，即使同类文献也是如此。“文体”则相对稳定，不同的文献可能拥有相同的文体。比如《国语》，从文献的角度而言，它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但是，从文体的角度来看，它首先是一部语类文献，尽管在语类文献中具有重要地位，但语类文献并不仅有《国语》。而且，《国语》“三段式”结构，从早期语类文体发展来看，属于事语体类型；而事语体则普遍见于早期语类文献。整体言之，早期文献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特定文体的生成过程。由于早期文献的制作往往基于特定观念，因此，着重分析文献的编撰过程，不但有助于把握文献的生成过程，同时也有助于澄清其文体特征的形成及其功能。

文献要以文体的形式呈现，特定的文献通常有特定的文体形式。文学作品也是如此，所以，“文学性”问题通常是与“文体”紧密关联在一起的。比如，先秦史传文献不仅具备“史”的身份，同时也极具文学色彩，从根本上来说，先秦史传文学性的生成，与原史传史方式密切相关。在传史方式上，原史经历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的转化，这种演化不仅促使《尚书》《春秋》《左传》等历史文献的生成，而且也使《国语》《左传》等史传文献具备丰富的文学性因素。这其中言事相兼的方式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促使先秦史传文献由追求过程性转为建构情节性，善于营造“故事化”，使文本情节更加曲折，人物形象也更加鲜明，因而更富有文学性。

职是之故，我们在讨论先秦文学作品时，首要的是将它们视为某种特定的文献，然后去分析这种文献的生成及文体特质，由此达到揭示先秦文学作品文学性生成之目的。基于这种考量，我们遴选《诗经》《尚书》《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论语》《老子》《庄子》九部文献作为讨论的对象，撷取它们富有特征且有研究价值的某一侧面加以探讨。

第一章 孔子“删诗”与《诗经》文本的再经典化※

夏传才先生认为近几十年“诗经学”存在四大公案，“诗经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学者所处时代不同，哲学、政治和学术观点有所差异，对若干课题的研究互有歧见，形成长期聚讼纷纭的公案。经过千百年的争论，有些公案已经解决（如诗全部入乐问题）；有些公案由于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已经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如五际四始）；近几十年研究比较集中的是四大公案：孔子“删诗”问题；《毛诗序》的作者和尊废问题；《商颂》的时代问题；《国风》作者与民歌的问题。”^①在四大公案中，孔子“删诗”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对此，夏先生指出：“近十几年，关于孔子‘删诗’的公案，通过开拓视野，全面地研究《诗经》与孔子的关系，大家的认识已经趋向明朗化了。”^②稍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引述并肯定匡亚明《孔子评传》的相关看法，并表示说：“关于孔子‘删诗’的公案，问题趋向明朗化了，可下结论说：孔子对《诗经》作了重要的整理编订。”^③按照夏传才先生的分析，作为四大公案之一的孔子“删诗”问题业已取得较圆满的解决。现在距夏先生所提出判断之时又过去二十余年，在此期间，有关孔子“删诗”的讨论似乎还没有结束。^④这也就意味着，孔子“删诗”

※ 本章系与鲍远航老师合作。

① 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

② 夏传才：《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

③ 夏传才：《〈诗经〉难题与公案研究的新进展》，《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

④ 比如《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连续刊发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马银琴《再议孔子删〈诗〉》、刘丽文《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说》讨论孔子“删诗”问题的文章。

问题在明朗化的背后还存在若干环节尚需澄清。有鉴于此，下文在早期《诗》文本结集、传流之视野下审视孔子“删诗”行为及其意义，亦即结合孔子“删诗”行为来考察《诗经》文本经典化过程。

一、孔子“删诗”说源流及相关争论

孔子“删诗”说通常被认为是由司马迁首先提出的，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①

司马迁指出，孔子根据“可施于礼义”的原则，通过“去其重”的方式，将三千余篇古诗整编为三百〇五篇。在此，司马迁描述古诗由三千余篇到三百〇五篇的经过，似乎暗含“删诗”的意味，但他只是突出“去其重”，并没有直接提出“删诗”。《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②《尚书序》明确提出“删诗”之说，但《尚书序》是否出自孔安国之手是有争议的，故暂存疑。有学者指出直言“删诗”的文献始见于汉末魏晋的项岱，其《汉书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36-1938页。

^② 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叙传》说“虞夏商周，孔纂其业。纂书删诗，缀礼正乐”。^①项岱《汉书叙传》虽然提出“删诗”，但项岱本人的生卒年代难以确考。考虑到这一点，赵岐或许是最早明确提出“删诗”概念的，他在《孟子题辞》中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乃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②不过，赵岐虽提出“删诗”之说，但也难以否认赵岐受司马迁启发之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将“删诗”说溯自司马迁也未尝不可。

司马迁认为，《诗经》是孔子“去其重”，或者说是“删诗”的结果，那么，他的这个判断是怎样产生的呢？或者说，此结论是出于司马迁的独创，还是别有渊源呢？《论语·子罕》篇载孔子之言：“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③孔子明言曾经整理《雅》、《颂》，尽管没有说明自己是如何整理的，并且没有涉及《风》诗，但经过这番整理，“《雅》归《雅》，《颂》归《颂》，各有适当的安置”^④。《庄子·天运》篇记载孔子对老聃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⑤，此处的“治”通常训为“研究”，所以很难据此推断孔子整理《诗经》。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曰：“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⑥《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之言：“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⑦倘若说《性自命出》篇只是笼统地说圣人“论会”《诗》，其中“圣人”指向还不清楚的话，那么司马谈则非常肯定地认为“论《诗》”是孔子所为。又《史记·儒林列传》载太史公曰：“故孔子闵王路

① 韩宏韬：《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1期。

② 焦循：《孟子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8页。

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2页。

④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2页。

⑤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9页。

⑥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页。

⑦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5页。

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①此条记载说明司马迁认可其父的看法。从《性自命出》篇到司马谈，《诗》为圣人（孔子）所“论”的思路是清晰的。何谓“论”，顾颉刚先生说：“‘论’字古但作‘仑’，就是把竹简排比为一册的意思。”^②章太炎先生有更为详细的论证：

“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比竹为之，故“仑”字从“仑”，引申则乐音有秩亦曰仑，“于论鼓钟”是也；言说有序亦曰仑，“坐而论道”是也。《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比竹成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③

按《说文》云：“仑，思也。从亼册。”段《注》说：“仑下曰：‘仑，理也。’《大雅》毛传曰：‘论，思也。’按论者，仑之假借，思与理，义同也。思犹颺也。凡人之思必依其理。伦、论字皆以仑会意。聚集简册必依其次第，求其文理。”^④段氏强调“论”为“仑”之假借，并不准确，但以“仑”为“聚集简册”是对的。《说文》云：“亼，三合也。从人一，象三合之形。凡亼之属皆从亼，读若集。”^⑤所谓“亼”，许嘉璐先生也说：“文献中无‘亼’字，会聚义都用‘集’。‘集，群鸟在木上也’。是‘亼’与集义近。云‘读若’，意在告诉人们二字实同一源，惟所施用范围不同（一抽象，一具体）而已。”^⑥据此，亼具有“集”义。“仑”字从亼从册，那么“仑”就具有“聚集简册”之意。又《国语·齐语》载：“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韦昭《注》云：“论，择也。”^⑦“仑”为聚集简册，这种聚集行为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15页。

②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③ 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④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⑥ 敖晶：《〈论语〉释名》，《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⑦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不是单纯对简册的汇集，还应该包含选择的行为，这样，“论”训“选择”就成为可能。以此观之，“论《诗》”在编排《诗》之同时也应伴随选择的行为。倘若说《论语》中“《雅》、《颂》各得其所”只是表明孔子编排《雅》《颂》的话，那么，从《性自命出》篇到司马谈，孔子“论《诗》”就不单单只是编排《诗》，而且还包含选择诗篇这层意思。尽管如此，“论《诗》”说与“删诗”说还是不能等同。这就表明，司马迁在接受其父看法时也发展了其父的观点。换言之，倘若要追溯司马迁“删诗”说之渊源，司马谈的“论《诗》”说并非其唯一来源。赵茂林先生推测孔子“删诗”说很可能源自《鲁诗》，他分析说：

《儒林列传》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说“周室衰而《关雎》作”，与《十二诸侯年表》“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同义，即以《关雎》为刺诗，用《鲁诗》义。而下面说孔子“论次《诗》、《书》”，即孔子论定编次了《诗》、《书》。显然，这段文字与上引《孔子世家》一段文字表达非常类似：这段文字先叙述《鲁诗》具体解说，而后说孔子论定《诗》、《书》；《孔子世家》先说孔子“删诗”，然后叙说《鲁诗》“四始”之义。因而，结合《儒林列传》此段文字来看，司马迁所述孔子“删诗”说很可能出自《鲁诗》。^①

如果这段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司马迁之所以提出“删诗”说，其实是建立在综合此前相关资料之基础上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了解司马迁“删诗”说的渊源。自从“删诗”说提出之后，人们对此展开颇为激烈的争论，周泉根先生分析说：“据洪湛侯先生梳理，认为孔子‘删诗’的，宋元有欧阳修、邵雍、程颢、周子

^① 赵茂林：《孔子“删诗”说的来源与产生背景》，《孔子研究》，2018年第5期。

醇、王应麟、马端临等，清初以来有顾炎武、范家相、赵坦、王崧等人；怀疑者或否定者则更多，宋明有郑樵、朱熹、吕祖谦、叶适、黄淳耀等，清有江永、朱彝尊、王士禛、赵翼、崔述、李惇、魏源、皮锡瑞、方玉润等。据笔者所见，越往后怀疑者越多，近现代以来，大多数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顾颉刚、钱玄同、张西堂、钱穆、张寿林等都怀疑孔子“删诗”一说。”^①这份名单或许还不周全，但大致可以反映在此问题上参与者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争论之激烈。至于怀疑或否定“删诗”的理由，蒋伯潜先生将其要点归纳为四个方面：

孔颖达《毛诗正义》曰：“书传所引之诗，见存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迂言未可信也。”此其一。《论语》记孔子言，两云“《诗》三百”，前已引之。孔子言《诗》，辄云三百，则其素所诵习，似止此数，非所自删。此其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于鲁太师；其事在孔子之前，而所歌之风，无出今十五国风之外者，周时诸侯岂仅此数？则季札时以之合乐亦仅此矣。此其三。后儒以《论语》记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故谓孔子删《诗》，以“贞淫”为标准。但《郑风》、《卫风》中言情之作，固仍在也。不但郑、卫，首篇《关雎》又何尝非言情之作？而逸《诗》之见于他书者，反多无关男女之情。如《论语·子罕》篇引逸《诗》曰：“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左传》成公九年引逸《诗》曰：“虽有丝麻，无弃管蒯，虽有姬姜，无弃憔悴。”昭公十二年引逸《诗》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诸如此类，岂得谓之“淫”哉！此其四。^②

① 周泉根：《从新出楚简逸诗重诂“删诗说”》，《新东方》，2016年第3期。

②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